

# 不均衡的写作

□方 岩

《朝霞》的结尾,歌声响起:  
“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 
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 
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 
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……”

这是1978年之前的《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》。小说的主人公阿诺说他梦见了马思聪。马思聪正是这首歌的作曲者,他在“文革”爆发后的第二年(1967年)途经香港远走美国。彼时的少年阿诺和他的小伙伴们正开始步入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”的好年华。

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”一语出自毛泽东,他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里,对数千名留苏学生说:“世界是你们的,也是我们的,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。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,正在兴旺时期,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。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。”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候是1957年,彼时的吴亮大概只有两三岁。伴随着“八九点钟的太阳”的本该是红彤彤的“朝霞”所隐喻的光明和希望。

后来,那个叫崔健的歌者如此形容这代人:

“看那八九点钟的太阳  
像红旗下的蛋……  
现实像个石头 精神像个蛋  
石头虽然坚硬 可蛋才是生命……  
若问我们是什么 红旗下的蛋”

很多年过去之后,吴亮终于可以坐下来聊聊他和他这代人的“朝霞”时光了。他说:“写作欲望被一种难以忘怀的

可是几年之后,等吴亮到了少年阿诺“八九点钟的太阳”的年纪时,他发现,他和阿诺们只能在上海这座城市里“如同游魂到处闲逛”,“浑浑噩噩,抬头望太阳都是灰乎乎的”,只能“没有目标地乱走”。

1974年,“革命”日薄西山之时,也是吴亮和阿诺们的少年时光接近尾声的时候,上海这座城市诞生了一本叫做《朝霞》的文学杂志,这本杂志受控于当时的上海市委工作组。“朝霞”的隐喻愈发显得诡异。到了1976年,吴亮和阿诺们似乎开始重新燃起希望:“朝霞满天,一个新世界将在悲剧之泪中诞生。”

词组、短句、没有标点没有段落泥沙俱下的长句;情节的片段、跳跃的叙述、思想的碎片、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,不同文类间的挪用、嫁接、拼贴,人称、视角的随意更换,普通话、沪语混杂,写还是不写、写什么、如何写、为什么写等关于写作本身的“元叙述”,这些因素在文本中相互交织,甚至是相互消解。于是,小说阅读的经验、小说理论的规训在《朝霞》面前统统失效。对此,一向自信雄辩的吴亮心知肚明,他用其一贯气势磅礴的语气,斩钉截铁地回应:“不均衡的写作就是最潮流的写作,刻意的不合常规,引人瞩目的风格先要招致讨厌,不习惯,打破惯例,绝不讲究古典式均衡也不在乎阅读断断续续……”

## 三

对待“不均衡的写作”的最好办法,便是“不均衡”的阅读和评判,即“揭露”吴亮的野心和匠心。

把《朝霞》描述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便是:阿诺与他的朋友们在“文革”十年间经历。其间,他们从小学升入中学。不久以后,有的上山,有的下乡,有的留在城市务工,有的赋闲在家。这群人时而相聚,时而离散。这种描述似乎符合我们关于“文革”的想象和阅读期待。只是吴亮要“故意与一部分读者偏执地关心人物情节的阅读习惯过不去”。所以,在直接涉及这群人的叙事片段中,没有革命的激荡也没有离散的悲情。在革命的风暴中心上海这座城市中,这群人总是能找到各种机会相聚,他们喝酒、聊天、“轧朋友”、交流读书心得。简而言之,“文革”故事的外衣下尽是心不在焉庸庸碌碌的日常。由此,这个看似正统的“文革”故事最终被细节和纹理消解。当革命的城市中游荡



童年经验唤起”。于是,便有了这部长篇小说《朝霞》。

## 二

童年经验唤起”。于是,便有了这部长篇小说《朝霞》。

童年经验唤起”。于是,便有了这部长篇小说《朝霞》。

吴亮说:“写出一种在那个时代似乎不可能的例外生活,那是错觉”。这是他欲盖弥彰的误导之辞。因为吴亮始终在掩盖真相:他只有把阿诺们变成城市里的失魂落魄的游荡者,风暴中心的冷眼旁观者,他方能从容地、缜密地审视自己与那段历史、那场革命的复杂关系,包括他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期待。所以吴亮最后承认:“在事后的阿诺们看来,无非是通过某种意外的经历,把阿诺放在某个可以自我观察的位置,进行新的定义,并且凭借这个定义,将自己塑造为一种更符合他所意愿的形象。”“意外的经历”其实是一种隐喻,是吴亮刻意保持的思考姿态:“叙述者虽置身在外,好像一切与他无关似的,深思熟虑,但愿他不是个假装的局外人,确立一个他觉得可以采取的视角,保持冷观的姿态,以乏味的语调吸引倾听,希望听者的注意力不要过于旁逸分神……叙述者,他姿态的力度将决定叙述的能量可以无穷尽地保持下去,这个离题的插叙。”

吴亮说:“写出一种在那个时代似乎不可能的例外生活,那是错觉”。这是他欲盖弥彰的误导之辞。因为吴亮始终在掩盖真相:他只有把阿诺们变成城市里的失魂落魄的游荡者,风暴中心的冷眼旁